　　身背专用小口径步枪，飞驰在皑皑白雪间，一袭红衣的张岩如同“猎手”般矫健。零下10摄氏度的凛冽寒风，没有吹歪她的准星，一轮卧射一轮立射，10发子弹射中9发。可惜滑行拖了她的后腿，3圈下来落后最快者2分多钟。  
　　当地时间2月10日晚，在阿尔卑西亚冬季两项中心，中国“90后姐妹花”张岩、唐佳琳携手出战平昌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7.5公里短距离比赛。能站到这里并不容易，从去年11月连续征战6站世界杯，一路走来困难如影随形，最终她俩争气地拿到通往平昌的外卡资格。  
　　从解放军八一雪上大队进入国家队，两个姑娘身上都打着军人的烙印。“不怕苦不怕累，打一场漂亮的胜仗。”带着使命感登上冬奥赛场，她们渴望超越自己。尽管两人在亚洲算顶尖选手，但与欧美高手在滑行环节的巨大差距，让中国健儿追赶强者的征程只能再等4年。张岩的第三十八名，已是近几届冬奥会中国选手的较好成绩。  
　　“这个项目不确定因素比较多，我们能依靠的就是射击更稳定，每脱靶一发子弹加罚150米，差20多秒一下就落后了。毕竟，我们的体力和能力跟最优秀选手差得挺多的。”赛后，张岩心情平静，每年三四个月的国外训练和比赛，让她很清楚这条“鸿沟”有多深。  
　　冬季两项并不是中国选手的强项，但不意味着没有与世界高手“掰手腕”的可能。20年前的长野冬奥会上，于淑梅曾夺得女子7.5公里短距离第五名，而后她还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但一段时间的人才“断层”，让中国冬季两项陷入低谷。“平昌冬奥会只有我俩拿到参赛资格，团体接力比赛都参加不了。”张岩有些无奈。  
　　面对薄弱的家底，“走出去，请进来”成为恶补短板的捷径。去年7月，新的挪威外教接手执教中国冬季两项队，在训练技术、射击方式、对滑行的理解上带来不少先进理念。但由于意外原因，还没磨合好就被迫更换另一个外教，训练不够系统多少影响了备战。唐佳琳坦言，“接触新东西需要时间去消化，才能在比赛中体现出来。”  
　　平昌冬季两项赛场，看台上挤满各国观众，欢呼加油声此起彼伏。想到4年后在家门口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两个姑娘掩饰不住地憧憬，“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一定会坚持到那时候。”而在她们身后，冬青奥会冠军孟繁棋等一批有潜力的年轻人也逐渐顶了上来。“如果有一个稳定的教练和团队，2022年还是很有希望的。”唐佳琳说。  
　　平昌的夜深了，中国姑娘们渐渐走远。她们的肩头，不只背着滑雪板，更担负着中国冬季两项寻求突破的梦想。  
　　2月10日下午，在平昌阿尔卑西亚越野滑雪中心进行的本届冬奥会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7.5公里古典式+7.5公里自由式）项目比赛中，20岁的中国小将池春雪以46分39秒0的成绩获得了第五十五名，另一名中国选手李馨则以46分01秒9的成绩排在第五十一位。该项目的冠军被瑞典选手卡拉获得，这也是本届冬奥会产生的首枚金牌。  
　　尽管在总共60名参赛选手中只有5人在自己之后冲过终点线，但池春雪并未对自己在本届冬奥会上的表现感到失望，“尽管身体不是处在最好的状态，但我在比赛中慢慢调整，滑行越来越好，包括到最后比赛最艰难的阶段也能够继续发力，感觉挺满意的。”池春雪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次宝贵的锻炼机会。”  
　　虽然池春雪是首次参加冬奥会，但她已经可以算是奥运赛场上的“老将”，2016年利勒哈默尔冬青奥会中，池春雪在越野滑雪女子5公里自由式比赛中夺得银牌，这也是中国在冬青奥会越野滑雪项目历史上的首枚奖牌。两年之后，池春雪的奥运之旅去掉了一个“青”字，虽然各个项目的距离有所加长，但她对比赛本身没有任何不适应，“平时参加积分赛和世界杯等比赛，也是长距离，这一点上没有任何问题。”  
　　从冬青奥到冬奥，真正让池春雪感受到变化巨大的是身边的对手，与奥运六金得主比约根、奥运冠军卡拉等世界级名将同场竞技，池春雪也从奖牌获得者变为了“菜鸟”，感到了与顶级选手之间存在的明显差距，“缩短这些差距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池春雪说，“在世界领先的挪威等国，越野滑雪是个全民参与的项目，而在国内，这个项目的认知度和接受度相对还比较低。”  
　　越野滑雪作为冬季运动的基础项目之一，也是非常艰苦的运动项目。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和单板滑雪U形场地等我国优势或潜优势雪上项目相比，越野滑雪的此前很长时间的开展状况并不理想，不过随着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越野滑雪的训练条件有所改善。从去年开始，中国越野滑雪队开始到各方面条件更好的国外进行训练，也聘请了更高水平的外教。  
　　这些变化也让池春雪看到了更多希望，“现在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踏实了才能走得更远。给中国的越野滑雪一些时间，让我们慢慢向国际靠拢。”  
　　编者的话  
　　“春打六九头”，立春刚过，乍暖还寒。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贫困户盘点着一年的收入，盘算着来年的计划。他们，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生产状况，一步一个脚印奋力摆脱贫困。正是贫困户战胜贫困、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不竭内生动力，给中国的扶贫事业注入了蓬勃生机，没有他们的孜孜以求，没有他们的顽强拼搏，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战胜贫困的目标，就会大打折扣。  
　　行动，是行动者的通行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脱贫攻坚不断向预定目标迈进。按国家现行贫困标准测算，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又减少128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目前，全国还有贫困人口3046万人，让他们如期实现脱贫，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近日，本报记者走村串户，探访贫困家庭的生产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期盼、纠结和欢乐。通过这组报道，我们感受到了贫困户脱贫的信心和决心，看到了他们的行动。  
　　要及时纠正个别地方存在的过度扶贫倾向，营造一种“劳动光荣、脱贫光荣”的社会环境，引导群众自立自强、向上向善  
　　  
　　近期去贫困地区采访，基层干部道出一种现象：这两年涉贫上访数量增加，比较集中的一类上访是，非贫困户认为自己按照标准应该被识别为贫困户，但由于被“潜规则”，没能享受到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调查核实发现，这类上访户中，除了部分边缘贫困户，甚至还有生活条件尚可的农户，这些农户看见贫困户享受到一系列政策红利和方便，就得了“红眼病”，通过上访“讨说法”。  
　　从各方反馈来看，这种由于“红眼羡贫”引发的农村不和谐苗头，需要引起足够重视。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采取针对性措施。  
　　一方面，贫困户识别确实存在不精准的个别现象。扶贫系统一直高度重视精准识贫，历经数次“回头看”和动态调整挤水分，扶贫对象识别的精准程度大为提高。但不可否认，要在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做这么精准的工作，出现纰漏和瑕疵在所难免。比如，个别基层干部存在优亲厚友等不公道现象，也有个别贫困户因为群众基础差，票选选不上等问题。此外，实际工作中，真要做到完全精准识别确实也很难。以收入指标为例，一般农户很难算精准收入账，按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扶贫线，你家人均纯收入2280元，属于扶贫对象；他家人均纯收入2320元，属于边缘贫困户。其实两家条件差不多，但这样划分贫与非贫，一些群众就有意见。因此，一些边缘贫困户的上访也有自己的道理。  
　　对于确实符合扶贫标准而因各种原因被“拒之门外”的农户，要及时纠正，纳入扶贫对象。对边缘贫困户的合理诉求，也要予以正视并适当关照。比如，有条件的地方要在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时，尽可能一同考虑边缘贫困户，加以扶持，一些惠农项目也可以考虑适当向边缘贫困户倾斜。  
　　另一方面，对于确实是“红眼羡贫”的上访户，要予以正确引导。首先，要摆事实讲道理，告诉他们为什么没被识别为扶贫对象，引导他们认识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好日子要靠勤劳的双手去开创，而不应一心想着“揩油”“沾光”。其次，要在农村开展专题教育，发动群众评选先进、建立或完善村规民约约束落后，通过这些接地气的方式，营造一种“劳动光荣、脱贫光荣”的社会环境，引导群众自立自强、向上向善。  
　　“红眼羡贫”引发农村出现不和谐苗头，也在提醒着我们，要适当调整扶贫工作方法方式。  
　　要扶真贫，真扶贫。应当看到，“红眼”的直接诱因是扶贫政策礼包越来越大。实际工作中，要严格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要及时纠正个别地方存在的过度扶贫倾向，比如把“住房安全有保障”升格成“住大房、住好房”，这样只会加剧非贫困户对贫困户的眼红和不满，加剧农村不和谐。当然，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相适应的投入，不可因此缩手缩脚，更不可盲目降低标准，影响脱贫质量。  
　　还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好扶贫关键小事。部分群众的“红眼羡贫”，跟他们耳闻目睹基层扶贫领域微腐败，继而引发心理不平衡不无关系。要加强对基层扶贫优亲厚友等不公平现象的处理，加大对扶贫领域贪污腐败的惩处。为完成脱贫任务短时间大量投入，导致群众对扶贫政策含金量的过高误判，引发心理失衡，影响社会和谐，这样的突击脱贫要避免。  
　　贫困户，忙得很，忙得紧  
　　“三宝，该过年了，啥时候回来？”“今天就回去，到村里杀一头肥猪，给大伙分点肉过年。”电话里传出三轮车的“突突”声。  
　　“路上慢点！”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黑林沟村贫困户张正旭挂断手机，对记者说，三宝是儿子张成清的小名。自打去年到养猪场上班后，他就很少着家。  
　　2月2日，从龙泉关镇出发，沿山路七绕八绕爬到一处向阳的山窝，百十户人家上下错落，“嵌”在山腰。巴掌大的地方，不是上坡就是下坡。  
　　推开木栅栏，就是张正旭家。老人今年71岁，不停咳嗽。“胃病、肺气肿，一天到晚离不开药。”老人拿出大大小小几个药瓶子晃了晃。  
　　家里有13亩多地，大多是岗上旱地，七零八落好几块。山上没水，过去只能种点玉米、山药和豆子。老人家说：“玉米一亩地收600多斤，卖400来块钱。算上人工，剩不了多少。”  
　　老两口年纪大了，儿子出去打工，地也种不动了。过去，他们就和街坊邻居在农忙时互相帮工，收点口粮。村里留守的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巍巍太行山，苹果格外甜。2015年，县里引进一家专业公司种高山苹果，引导贫困户把土地集中流转，每年每亩地租金900元左右。这下可把老人们“解放”了，张正旭把地全部流转。粗略一算，一年收入过万元。“不用操心，稳稳当当收租金。”  
　　种地不愁了，还愁房子。老人一家住在3个小房间中，共35平方米。这是祖上留下的土屋，小青瓦，石头垒，泥巴糊，低矮阴暗，顶棚糊着报纸，到处弥漫着土腥气。四处透风，屋里烧着炉子，洗菜盆里结着冰碴子。老人说：“我都70多了，也不记得这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  
　　村子地处海拔1000多米的山上，老人家说：“夏天还好，冬天可就苦了，下雪就出不去了。”走遍全村共101户，平时住人的仅40多户。60岁的人在村里就是“后生”，前年村里一位老人过世，连抬棺材的年轻人都凑不齐。村子到镇上只有一条山路，老人说：“到镇上赶集，出去一趟一个半钟头，回来净上坡，要两个钟头。”  
　　治病要紧，治穷更要紧  
　　村里只有赤脚医生，看大病要到镇上和县城。三宝16岁那年冬天，得了急性眼底出血。因为耽误治疗，右眼留下残疾。张正旭老念叨：“要不是住在这山窝里，儿子的眼睛就能治好。”  
　　穷山沟难养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96个，眼下还有60多个。龙泉关镇动员村子整体搬迁，挪穷窝，拔穷根。有的老人听说后，先是不敢相信，问清楚后不禁热泪盈眶：“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下山住新房！”  
　　山里人盼的，不再是梦想。龙泉关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规划建设500多套房子，安置黑林沟等村共500多户。预计到今年夏天，首批钥匙就可以交付了。张正旭说：“做梦都想早点搬下去，上城里买东西、看病，娃娃们上学都方便！”  
　　好事不只是住新房，老人最发愁儿子没正事，现在也安生了。他说，三宝过去在外打零工，搞装修，挣的看着不少，开销更大。有段时间，三宝身体不好，烦心事多，有时会到村里、镇上“惹点麻烦”，老人也不省心。  
　　转机在前年秋天，村里成立山林黑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郑耀军知道三宝有手艺，让他来养殖场做事，每月工资3000元。这下三宝乐坏了，天天忙得像陀螺，平时住在那边，挤时间回来看看爹娘。三宝说：“前两天一头母猪下猪娃，我两宿没睡好！”有事做，有钱挣，他就“没空”瞎折腾。村干部、镇干部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都说三宝脱贫不成问题。  
　　看着儿子成了“领工资的人”，张正旭心里像喝了蜜一样，见到三宝就嘱咐：“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要咬住目标，好好干！”  
　　为帮扶张正旭等贫困户，合作社出资为20多个老弱病残户入股，将来见效益后，每年有分红。现在刚起步，为了乡亲们先见到实惠，合作社前不久给每户发一壶花生油。要过年了，合作社特意挑了一头大肥猪，送回村杀年猪。  
　　劈柴响，炉火红。听说杀年猪，在家的男女老少围过来看热闹，三宝最带劲：“这是养殖场挂了号的大肥猪，有390多斤，过年有肉吃喽！”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站塘乡新圩镇农民兄弟在灯杆上悬挂灯笼，喜迎新春佳节。  
　　朱海鹏摄（人民视觉）  
　　像爱护眼珠一样，呵护“脱贫蜂”  
　　连续多日的雨雪天似乎暂时告一段落，沈裕胜家的蜂箱却还裹着厚厚的棉被。“气温还是很低，怕给蜜蜂冻坏了。”他说。  
　　差不多1个月前，蜂箱里产出的最后一批蜂蜜，被沈裕胜以每斤40块的价卖出。年终算账，蜂蜜一共卖了800斤，收入3万多元。从2015年开始的蜜蜂养殖，使家庭收入稳步增加。  
　　在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石头村，沈裕胜本来算不上村里的贫困户。一家6口人，田土虽然只有4.8亩，但靠着沈裕胜多年在外务工的收入，日子还过得去。1947年出生的沈裕胜，个子不高，浑身都是劲。在建筑工地干活，他一次就能扛两袋水泥。命运却似乎偏偏要跟他的身体作对。2012年，远在郑州打工的他突然中风，一家人的命运从此“拐了个大弯”。  
　　“那次发病，整整4个小时，身体一点知觉都没有。”打那以后，原本闲不住的沈裕胜，绝大部分时间只能在老家静养康复。  
　　祸不单行。2014年，沈裕胜的爱人体重骤降40斤，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严重的糖尿病。从此，她跟老伴一样，药不离手。沈裕胜只有一个儿子，但先天性高度近视。因为视力问题，外出找工作总是吃闭门羹，只能在家干点零活。  
　　大笔医药开支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压上了重重的担子。2014年，沈裕胜一家成了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沈裕胜身体恢复得不错，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是他再也不能出去干重活。守着家里那么大点地，老头常常发愁——要脱贫，光靠种地能行吗？  
　　结构调整，脱贫路上田地宽  
　　家里4.8亩耕地，分成了五丘田。以前种的是双季稻，自打沈裕胜中风以后，不得不改种单季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除去自家口粮，也就卖个2000多斤。虽说国家这几年托底收购价慢慢在涨，但拿到手的收入还是不到3000块。  
　　2015年，镇上和村里的扶贫干部推荐沈裕胜养蜜蜂——既不用出远门，劳动强度也不算大，儿子还被送到镇上免费学习养蜂技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沈裕胜从亲朋好友那里凑了点钱，在家里搞起了蜜蜂养殖。  
　　头一年试水，结果并不理想。因为技术不熟练，5箱蜜蜂，蜂蜜也就卖了2000多块。第二年，政府奖了3000元产业扶贫资金，加上开始摸着点门道，沈裕胜的养蜂规模一下扩大到20箱。  
　　“镇上和村里的干部都帮我卖蜂蜜，还帮我放到农村淘宝网上卖。”沈裕胜说，那一年的蜂蜜卖了1万多块。  
　　初尝甜头后，沈裕胜继续扩大养蜂规模。石头村地处丘陵，春有油菜花，秋有油茶花。沈裕胜一年能收两次蜜，一箱蜜蜂能产蜂蜜大约30斤。2017年，家里养蜂扩大到30多箱，养蜂收入一下就超过了3万元。“家里还养了20多只鸡，20多只鹅。”岁末年初，扶贫干部入户核算，沈裕胜一家实打实地脱了贫。  
　　屋外朔风凛冽，沈裕胜端上了热气腾腾的蜂蜜水，笑着说：“就剩这点存货了，留给家里用。如今这日子，又跟蜂蜜一样甜了起来。”  
　　去年，沈裕胜所在的湘乡市编制了《湘乡市产业精准扶贫规划》，加大了产业扶贫支持力度，着力支持省定贫困村发展油茶、猪牛羊养殖、竹木加工等70个产业，使贫困户人均增收4000元。  
　　今年，沈裕胜还打算多养点蜜蜂。为了配合养蜂，他在自家的田里还种上了3亩多油菜。站在自家的一块田埂边，沈裕胜手指地里的油菜苗：“到了春天，就能看到金灿灿的油菜花。”  
　　天上掉下来的羊羔，稀罕着呢  
　　农历新年前夕，记者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呼日勒图嘎查，牧民乌力吉门德开门迎接客人，一股温暖的热浪顿时将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拒之门外。  
　　乌力吉门德的母亲有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前几年，父亲患了胃癌，加上要供2个孩子上学，家庭每年3万元左右的毛收入，交完孩子学费生活费、购买过冬草料后就所剩无几了，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医药费，他家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  
　　2009年，乌力吉门德和妻子不得不卖掉所有羔羊外出打工，靠每人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维持生活。  
　　在内蒙古农村牧区，因病致贫是最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原本正常维持生产生活的农牧民家庭，只要有一人患大病或重病，一年间就可能陷入贫困，难以翻身。在大多数旗县，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分别占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五成左右。西乌旗副旗长玛希巴特尔告诉记者，过去，扶贫都是把羊直接送给牧民，但有些牧民领走羊后，很快就卖掉解燃眉之急了，很难保证他们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当地想出了“流动畜群”帮助牧民脱贫的办法。  
　　“咩咩……”走进蒙古包，门口木栅栏里几只雪白的小羊羔抬起稚嫩的前蹄扒着栅栏，眼巴巴地望着乌力吉门德。“这是在要奶喝呢！”乌力吉门德黝黑的面庞透出喜悦，“过年正好赶上接冬羔，这几只羔子膘情不好，需要抱到屋里喂奶。累是累，但值得，因为这些羊羔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呢！”  
　　这些“天上掉下来的羊羔”，就是源于西乌旗提出的“流动畜群”政策。2013年，当地政府为有经营能力的少畜牧民提供4万元资金购买基础母羊，交给牧民无偿饲养。4年后，牧民还给政府同样数量的基础母羊，繁育的羔羊归牧民所有。畜群在牧民之间不断流动，实现牧民增收，政府再把收回的基础母羊分配给其他牧民饲养增收，形成用有限资金持续为牧民增收的“无限循环”。  
　　好政策，就是及时雨  
　　“这和以往的帮扶模式截然不同。”玛希巴特尔说，“现在，牧民找到担保人，我们同牧民签订养殖发展协议书，到了养殖年限还要收回同等数量的基础母羊。这样一来，牧民既能得到实惠，又受到一定约束，从主客观两方面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保护草场，西乌旗还鼓励牧民由过去的冬羔、春羔两季接羔向早冬羔、冬羔和春羔的三季接羔转变。提前生产的羊羔能在秋季草场结草籽前出栏，还能享受政府补贴。这样既有利于草原自我修复，又增加了牧民收入。  
　　接冬羔意味着每年春节期间就要迎来接羔季节，牧民们都要在繁忙中度过，清理棚圈、准备饲草、分割围栏、接羔保育……忙得人不亦乐乎。“生活越过越好啊！”牧民吉仁巴雅尔告诉记者，他家拥有2500亩草场，2013年以前，一家人的收入全靠放牧50多只羊。“那时到了出栏季节，不得不卖掉全部羊羔，一年的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根本没有能力扩大再生产。”  
　　自从享受到“流动畜群”政策，用第一笔资金购买了60只基础母羊，3年来多，吉仁巴雅尔家的羊群已壮大到300多只，紧紧巴巴的生活宽松了许多。2017年，他选了60只基础母羊还给嘎查，繁殖羔羊则留在了他家。伴随着生产资料的增加，55岁的吉仁巴雅尔一家有了扩大再生产能力，也有了新年的新打算。  
　　“流动畜，这招忒好！2017年是我家饲养流动畜的最后一年，我算了算，还给政府60只母羊后，我自己留下100只羊，把其余的300来只羊卖掉可以买30头牛。羊少了有利于草场保护，牛的价格比较稳定，我家的产业结构也比较合理了。牧民有了畜群就有底气，2018年我单靠卖牛犊就收入10来万元……”吉仁巴雅尔喜笑颜开。  
　　河南西北角的台前县，地处黄河滩区，是一个深度贫困县。以前，这里“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年年有洪涝，岁岁闹饥荒”。而今，县里迎来大批返乡创业青年，赢得乡村振兴新机遇——  
　　全县崛起汽车零部件企业500多家；羽绒产品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框产业占全国50%以上市场份额……据不完全统计，近3年，3367名台前人返乡创业，带动3.28万名农民就业增收。  
　　“台前许多产业‘无中生有’，一批批外出的人才带着技术、资金，带着经验、情怀回乡，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希望！”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说。  
　　乡村振兴，关键看人气。农村人才怎么引得来，留得住？记者进行了调查。  
　　为何引得来？  
　　产业有基础，用地用工成本低  
　　在台前县，飞出去的“凤凰”，缘何愿意回乡？  
　　记者调查了解，不少人看中乡村创业成本低。吴玉磊、丁小燕大学毕业后，留在郑州打拼。2011年，两人辞职创业，看中舞蹈服和舞鞋生意，七拼八凑，开了个40多平方米的代销店。第二年，两人借用亲戚的旧房子当车间，雇佣20多名工人，挣下第一桶金。  
　　“时间一长，用工成本高，技术工人流失，想扩大规模，大城市缺少空间。我们一盘算，如果回老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吴玉磊说，老家有场地，乡亲们也有做鞋的手艺，算工价，每月人均便宜近千元。  
　　2013年，吴玉磊两口子回到台前县清水河乡岳庄村。一开始，他们购置缝纫机，培训工人，在自家小院办起鞋厂。之后，租地建起“扶贫车间”，安置就业50多人。技术有保障，产品有质量，销路越来越广。如今，年销售舞鞋100多万双，产值近千万元。  
　　有人返乡是看到产业基础。马楼镇人满慎波原本在内蒙古做汽配批发生意，年销售额2000万元，但他一直有发展绿色农业的梦想。“滥用化肥、农药，让果蔬品质下降。我想种出绿色农产品，找到记忆中的味道。”满慎波说。2017年春，他拿出200多万元，流转土地560亩，开始在黄河滩发展农业。  
　　有人返乡是因为家庭所需。打渔陈镇周庄村的杨纪彬、姜玉芬夫妇回乡，初衷是不愿再让孩子“留守”。  
　　2008年，杨纪彬、姜玉芬从北京一家服装厂辞工，回乡做服装加工。因为技术不过关，一年后创业失败，十多万元投资打了水漂。夫妻俩到杭州打工，虽说俩人每月能挣1万多元，可始终牵挂老人、孩子。2015年，夫妻俩再次回乡创业，从代工做起，如今已建起500多平方米厂房，自创童装品牌——“妙妙虫”。  
　　如何干得好？  
　　土地难批、贷款难拿，完善软环境是关键  
　　回乡创业，说来轻松，干起来不易。  
　　记者采访中了解，对于许多返乡创业者而言，最大的难题首先是土地问题。创业者多以家庭小作坊式生产起家，想扩大规模，建设厂房，租地是第一关。  
　　后方乡玉皇岭村的王楠自学做相框。创业之初，因土地难租，一年多无法新建车间。2015年，县里鼓励建设“扶贫车间”。王楠终于获准建起占地15亩的厂房，吸纳70人就业。  
　　采访发现，当地“扶贫车间”政策使一大批小企业有了“长大个”的机会。长远来看，如何优化集体土地租用政策，依然是返乡创业者最关心的事。  
　　其次是资金问题，集中在贷款难。建新车间，买新设备，王楠花了300多万元。他把多年积蓄全部投入，仍有很大缺口。于是，王楠把房子抵押，贷80万元，勉强凑够。厂子运行后，周转资金左挪右支，捉襟见肘。幸亏乡里协调50万元的扶贫贷款，才解燃眉之急。  
　　“做企业，经常感觉缺资金。”姜玉芬坦言，有时候货款回流不及时，她和丈夫不得不贷款发工资。在政府帮助下，他们拿到100万元的扶贫贷款，由政府贴息。  
　　创业者普遍面临融资渠道单一问题。专家建议，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  
　　当创业者迈上一个新台阶，面临的最大短板是管理、技术人才。  
　　吴玉磊刚回乡时，请一个同乡负责舞鞋生产。老乡懂缝纫，但不懂做鞋，领着工人生产出一批残次品，全部压在仓库。吴玉磊一年赔了100多万元，几乎破产。无奈，妻子丁小燕只好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回乡，亲自上阵，才扭转市场。“在村里干事，特别想招大学生来管理，可谈了几个，不是嫌工资低，就是不愿意下乡。”丁小燕说。  
　　管理人才难觅，技术人才难招。马楼乡小伙赵阳依托台前县汽配行业优势，做起电子商务，2017年网上销售收入800多万元。现在，他最头疼的也是人才。“特别缺客服、网站美工。”赵阳说，他试着在网上招聘，应者寥寥。  
　　“培训一直没停过，但农村电商发展迅猛，始终不够用。”台前县电子商务办公室主任付